

## 唯物史观具体化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与必然走向

■ 赵志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定义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三重逻辑：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科学把握唯物史观深入社会现实的性质，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这三重逻辑，进而领悟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 一、唯物史观内地包含具体化的原则

唯物史观终止了纯粹思辨，指向现实生活，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历史观。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通过研究西欧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在《资本论》中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

但是，唯物史观不是供奉起来要我们去跪拜的教条，它内地包含着具体化，即深入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原则和要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论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7年，针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马克思观点教条式的歪曲，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给予有力的驳斥：“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恩格斯也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发展着的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贯彻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关键在于破除对唯物史观原理的教条式理解，把它当作研究问题的起点、方法和指南，并深入社会一历史的现实中去。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了黑格尔“现实”概念的科学性：“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因此，现实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经验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决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实存”，而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即展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来。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将现实的本质性最终导入“思辨的思维”，即“观念”中。马克思将黑格尔对现实的颠倒理解纠正过来，把现实的本性导回社会一历史中，即导回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导回人们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中。

### 二、唯物史观具体化视域下中国现代化的三重现实

贯彻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我们必须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重现实：

第一，现代化是人类开启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所带来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经由现代化才能抵达。现代化是由西欧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所启动的。可以说，西欧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西欧取得统治地位，开启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是，资本主义一旦产生，它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一定会跃出欧洲疆界，带来“世界历史”。因为，这样一个时代不仅意味着农业文明要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被商品经济所取代，同时也意味着各民族相对孤立发展的历史要被“世界历史”所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而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

巨大生产力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激荡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但却是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出场的。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唯有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必须经由现代化才能抵达。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地与社会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也不只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可走。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也已经表明，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一方面无法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即通过早期血腥的原始积累和殖民主义敲开现代化的大门。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中要想摆脱“支配—从属”“中心—边陲”“主导—依附”结构中“从属、边陲、依附”的命运，就不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必须寻找新的现代化道路。只有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唯物史观内地包含着具体化，其实也内地包含着辩证法，即“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但是，这种“否定”是“扬弃”，不是割断历史、全部抛弃，是在“肯定的理解中”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是无法割断的，现代化既是反传统的结果，同时也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必须符合中国独特的国情，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彰显中国特色。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好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实际上，这种契合性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大地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因素。

### 三、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化的三重现实鲜明地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三重逻辑：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基于三重现实，依循三重逻辑而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展现出一种新的逻辑（必然趋势）：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首先，在当今时代，西方式现代化面临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病症。从文明传承发展的角度看，中西方文明都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西方文明在工业时代领先，开启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是，西方文明也带来诸多现代性问题，显现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病症，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紧张。针对现代性困境，西方理论界、学术界也展开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比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就是这种批判和反思的表现，尽管它们都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反思的彻底性。但是，西方现实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理会这些反思和批判，并没有展现出一种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趋势和可能。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超越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像西方式现代化那样通过战争和不平等的国际规则把现代性的“自然限度”和“社会生活限度”转嫁给其他国家，而只能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已经展现出超越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

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顺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做出明确阐发，这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现出超越现代性的必然趋势。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可以互相成就，而且那些高度契合的世界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本身就蕴藏着解决现代性难题，开启新的文明形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发动的思想革命，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柏拉图主义，即超越了主客二分、心物二元的世界观。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超越这种二元世界观的现实基础，即抽象的、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把人看作抽象的“原子个人”。这种面向未来的哲学思想恰好在根基处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高度契合。实际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哲学存在论的意义上做了阐发：“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国家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因此，“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必将创造出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进而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AZD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JD770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共产党宣言》视域下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历史内涵探究

■ 韩天泽 牛晶晶

###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人民立场筑牢奋斗根基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群众观深刻塑造了党的初心使命。李汉俊提出革命须为“吾民”而努力；俞秀松在工作之余，不忘到铁厂亲自做工，做到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李启汉在上海开办工人半日学校，成为日后上海工人运动的真正孕育之地；毛泽东也在信中直言“很想做工”，皆彰显早期共产党人打破知识精英局限、扎根群众的自觉。此外，党的一大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将组织工人运动列为核心任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推动罢工浪潮，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等。党的二大强调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提出“农民教育”，为农民谋利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真正地做到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将《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群众观点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巧妙运用，将民族复兴使命与人民解放事业深度融合。

###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以革命血性锻造政党品格

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特征。《宣言》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思想，全文32次用到“斗争”一词，充满了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西方思潮的斗争中得以传播和发展，斗争也作为一种精神广泛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先驱的血液中，这一斗争精神深刻融入建党实践。组织工人运动不仅是共产党人贯彻群众路线的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妥协的思想根基，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便成为“思想先进、信仰坚定”的政党。

动补习学校。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学习《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更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斗争是极其壮烈的，而壮烈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牺牲。黄爱、庞人铨在罢工中壮烈牺牲；林祥谦和施洋在“二七惨案”中也遭到迫害。同志的牺牲增加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勇气。中国共产党人看着身边战友的倒下，不仅没有畏惧，还呼吁工人们更紧密地联合，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到底。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仅来自《宣言》，更来自自信。牺牲与斗争铸就了党的精神底色，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意志顽强、作风优良”的先锋队，在伟大斗争中开辟生存发展之路。

###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自我革命永葆政治本色

《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一论断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具有高度统一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章的修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在《宣言》的指导下，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是党章的雏形。在入党标准上，它指出：“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对党忠诚，不仅要遵守党的纪律，还要具备自我否定的精神和自我革命的斗志。党的二大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其中“纪律”一章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党自身发展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进行自我革命，体现出他们想把党建设成一个坚强先进的党的决心和对党无比忠诚的革命精神。确立和完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具有根本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员的初心不改和本色不变，以忠诚斗争精神的重大实践。早在建党之前，北京早期党组织就派邓中夏等同志在长辛店筹备劳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化传播的有效性。

### （三）用户体验提升

年轻群体是红色文旅项目的核心受众，其对“个性化、智能化”体验的需求，为AI与红色剧本杀的融合提供了用户基础。AI交互设计可实现“千人千面”的体验定制。根据游客的角色选择与对话内容，动态调整交互逻辑；同时，AI可记录游客的互动轨迹，生成“个人专属历史体验报告”，提升用户体验的专属感与获得感。

此外，AI技术还能解决传统剧本杀“对DM依赖度高”的问题：传统红色剧本杀的剧情推进与历史讲解高度依赖DM的专业能力，而AI人物可作为“辅助DM”，承担部分历史讲解与任务引导工作。

### （四）项目实施中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考虑到AI技术落地后，可能会出现“对话逻辑跑偏、用户体验不好”这类问题，这个项目得建立一套“迭代优化机制”。

在技术测试阶段，先请历史学者、研究红色文化的专家来审核AI的对话内容，把生成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回答改过来；再邀请不同年龄段的人来体验测试，收集大家的反馈，一点点优化AI模型。另外，还要制定“技术应急预案”，比如，要是AI系统出故障了，就马上切换成“人工辅助交互”的模式，保证体验流程不受影响。

### （五）文化传承价值

AI技术与红色剧本杀的融合，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增强红色历史的“可对话性”。一方面，AI历史人物可作为“活态历史载体”，解答游客关于历史背景、人物决策的疑问；另一方面，AI交互可拓展历史认知维度，通过“假设性对话”引导游客思考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如游客提问“如果当时情报被截获，会采取什么补救措施”，AI历史人物会推演出可能的应对方案，培养游客的历史思辨能力。

AI与红色剧本杀的融合，正是通过“主动提问—智能解答—深度思考”的闭环，让红色历史从“被动接收”转化为“主动探索”，增强文

## 红色剧本杀沉浸式体验馆的创新设想与AI融合的可行性研究

■ 赖惠萍 方玲敏 黄生强 刘舟舟 何周宇

人物交流的环节。最后是复盘环节，讲完原型的故事之后会让游客分享角色的感受，加强游客对红色精神的认识。

在流程设计上，还特意考虑了“轻量化体验”，每场时间控制在90-120分钟之间，剧情难度也分了“基础版”和“进阶版”。基础版任务逻辑较简单，适合带孩子的家庭游客和青少年；进阶版会增加线索的复杂程度，以满足一些资深玩家的需求。

### 二、AI技术与红色剧本杀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 （一）技术实现路径

项目主要靠三个技术模块：构建历史人物AI模型、开发多模态交互接口、设计贴合场景的对话逻辑。

历史人物AI模型的创建是先收集目标人物的传记、书信、相关文献等资料，再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训练专属的对话模型，保证AI模仿的人物、说话风格、对历史的认知都和真实人物一致。

从现在的技术成熟度来看，AI对话技术已经能支持这种场景化的交互，如ChatGLM、GPT这类大语言模型，稍微调整一下，就能实现特定角色的对话逻辑。

#### （二）文化传承价值

AI技术与红色剧本杀的融合，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增强红色历史的“可对话性”。一方面，AI历史人物可作为“活态历史载体”，解答游客关于历史背景、人物决策的疑问；另一方面，AI交互可拓展历史认知维度，通过“假设性对话”引导游客思考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如游客提问“如果当时情报被截获，会采取什么补救措施”，AI历史人物会推演出可能的应对方案，培养游客的历史思辨能力。

AI与红色剧本杀的融合，正是通过“主动提问—智能解答—深度思考”的闭环，让红色历史从“被动接收”转化为“主动探索”，增强文

## 数字乡村建设下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以榆社县为例

■ 王利霞

榆社县在过往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期受地理条件以及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局限，在产品销售渠道、农村服务供给方面存在发展困境。

数字乡村建设则可有效应对以上问题。在数字技术融入下，榆社县可进行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此外，在“互联网+”模式下，能拓宽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由此可见，围绕数字乡村建设下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展开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 一、当前榆社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国家重要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在数字化技术融入下乡村经济发展态势日益明显，内

在驱动逐步增强。对于榆社县而言，展开数字乡村建设可有效强化县域经济，增加农户收入。

榆社县历史悠久，在过去主要以农业和养殖业为经济发展形式。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当地主要种植玉米、高粱和谷子，2023年粮食产量约58720吨。养殖业则以猪、牛、羊、禽类为主，2023年全县猪、牛、羊、禽肉产量7571.5吨，禽蛋产量3798.3吨，奶产量74.1吨。在过去榆社县已经具备一定的传统农业生产规模和基础，但若想要实现农户增收，也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产品附加值低，在进入市场之后缺乏后续深入打造，导致利润空间有限。以玉米为例，主要是用于饲料加工和直接销售，极易受市场波动影响，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市场竞争能力较低且技术落后，导致农产品进入市场后很难与其他优质农产品竞争，消费量以及范围有限。

### 二、数字乡村建设在榆社县的实践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榆社县积极推进网络建设。截至2024年底，全县167个行政村均实现4G网络覆盖，5G网络的覆盖率也达到62%。2025年更是设立多个基站，为游客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网络支撑，进一步提高了云竹湖景区及周围区域的信号质量。物流配送方面，构建“城乡物流最后一公里”。当前，工作人员将登录平台便可向专家提问，得到技术指导。平台内汇集病虫害防治、种植、养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专家们会借助视频、音频、图片的方式解答农户问题，进而减少经济损失。除此之外，金融线上服务也能为农户提供更多资金保障。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因此为解决农户后顾之忧，应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引入金融机构设计线上服务，推出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如农业保险、贷款等。农户可在平台上申请贷款，而金融机构则基于线上大数据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提供资金支持。以农业保险为例，在出现经济损失时，农户可通过线上报案提

出索赔申请，而保险公司则会运用无人机等手段开定损理赔，从而确保款项能及时传递到农户手中，保障农户日常生产。

### 三、乡村数字治理与经济发展协同模式

政务服务数字化，通过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方式，将政务服务转移到网上办理，农户可通过登录平台有效办理户籍、民政、医保等相关事项，节约时间和精力。除此之外，平台内还可促进部门协同，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可有效避免由于重复提交材料而引发的多头办理问题，进一步保障办事效率。此外，乡村事务管理方面也可引入数字化，借助信息化技术，对土地、人口、资产展开全面的数字化管控。在系统中，村干部可及时了解村内的事务情况，找出问题并加以解决。比如，在管理系统运用下，工作人员可清楚地了解土地的位置、面积以及用途，防止出现土地纠纷。在人口管控方面，系统内录入全面的村民信息，能为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保障，进一步提高区域建设与发展质量。总之，在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展开阐述时可以发现，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榆社县实现经济建设的关键手段，榆社县当前已经展开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实践，后续工作重点是针对性地构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如“互联网+农业服务模式”“数字+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借助技术赋能科学强化榆社县发展内驱，为区域建设发展奠定基础。

###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乡村建设给榆社县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在数字技术设施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构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可打造智慧农业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在AI技术支持下，也能展开全程数字化管控，无论是前期种植还是后续产品加工和销售都高效透明，进一步保障产品安全。后续工作人员应继续围绕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展开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此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榆社县委党校）